

·中国学术百年·

社会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社会学会组织编写

主编 袁方

副主编 蔡文媚 宋书伟 杨雅彬



北京出版社

·中国学术百年·

社会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组织编写

主编 袁方

副主编 蔡文媚 宋书伟 杨雅彬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百年/袁方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10
(中国学术百年丛书)
ISBN 7-200-03940-3

I . 社… II . 袁… III . 社会学 - 历史 - 中国
IV . C91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298 号

·中国学术百年·
社会学百年
SHEHUIXUE BAINIAN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主编 袁方
副主编 蔡文媚 宋书伟 杨雅彬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47 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3940-3
C.61 定价:18.00 元

前 言

社会学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故本书取名《社会学百年》。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和即将迎来 21 世纪之际出版。其宗旨是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贯穿全书。本书试图将社会学思想及社会学家置于重大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流派中，以学理脉络的历史为“经”，以不同时期的专题研究为“纬”，概述中国社会学从社会哲学发展为当代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政策性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从而概括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行程。本书突出学术思想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将历史考察与社会分析融为一体，学术观点兼容并包，力求对百年来社会学学科走过的历程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总结。

社会学在中国的百年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简单地说，它经历了从国外传入、国内传播、逐步中国化、中断时期、恢复与重建几个发展阶段。

如果从中国社会制度性变迁的角度上看，中国社会学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主要源于西方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同时，中国社会学者为认识改造中国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努力；解放后，经过中断和历史的反思，恢复重建的新中国社会学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致力于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在国际上有了蓬勃

的发展，在促进全球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社会学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中也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是紧密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相联系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农村性质的辩论中，社会学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如何改造中国进行研究。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者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同时，唯物史观社会学也曾在中国占有席之地。

解放后中国社会学遭受挫折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本书在“社会学的中断”一章里对此作了分析。总的来说，建国以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而且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一门学科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虽然社会学中断多年，恢复后的社会学仍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蓬勃发展。

近20年来，社会学在对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社会调查及方法方面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重建社会学时，参考和吸收了国外几十年来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成果，但又不是完全照搬。当时主持此项工作的以费孝通先生为首的一批老一辈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建设适合当前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中国社会学，这就为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社会学恢复后的20年，不仅大大缩小了与国外社会学的差距，而且保留了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特色。在即将跨入21世纪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回顾中国社会学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对中国社会

学的下一个百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社会学事业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发展的关键在人才。我们高兴地看到，社会学重新恢复后，已经培养了大批的社会学专业人才，建立起一支跨世纪的年轻的社会学队伍。其中不少人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现在不少人已经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坚力量、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

现在，老一代社会学家中不少人陆续到了退休年龄，他们对新中国的社会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社会学今天的研究水平和理论建树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这个历史重担就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希望青年学者们在既充满机会又充满竞争的下一个世纪，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应发扬社会学老一辈务实求真、不图虚名和中年一代的开拓奋进的优良传统，促使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自有后来人。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中国社会学在下一个世纪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1)

上编 1949 年以前的社会学传播与发展

第一章 社会学的传入	(3)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社会学	(3)
第二节 早期的社会学思想	(10)
第三节 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严复	(23)
第二章 社会学的传播	(35)
第一节 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播	(35)
第二节 早期的唯物史观社会学	(46)
第三节 中国的社会变迁问题研究	(53)
第三章 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研究	(65)
第一节 30 年代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65)
第二节 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	(69)
第三节 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	(81)
第四章 不同的社会改造理论见解	(104)
第一节 乡村建设运动	(106)
第二节 发展都市救济农村	(114)
第三节 全盘西化主张	(119)
第四节 民族优生	(129)

第五节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	(140)
第五章	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与实践	(146)
第一节	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倡导者吴文藻	(148)
第二节	社区研究	(164)
第三节	少数民族调查	(173)

下编 50年代以后社会学学科的中断与重建

第六章	社会学的中断	(185)
第一节	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和社会学的取消	(185)
第二节	关于社会学地位和前途的讨论	(190)
第三节	关于取消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198)
第七章	重建期的基础建设	(201)
第一节	社会学的恢复	(201)
第二节	社会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初期人才培养	(208)
第三节	创建社会学系与出版图书期刊	(219)
第八章	社会转型时期专题研究	(229)
第一节	人口研究	(229)
第二节	小城镇研究	(251)
第三节	城市化研究	(259)
第四节	社会现代化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	(270)
第九章	台湾与香港社会学发展概况	(288)
第一节	台湾社会学的发展	(288)
第二节	香港社会学的发展	(299)
结语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	(306)
后记		(320)
参考文献		(322)

上 编

1949 年以前的社会学
传播与发展



第一 章

社会学的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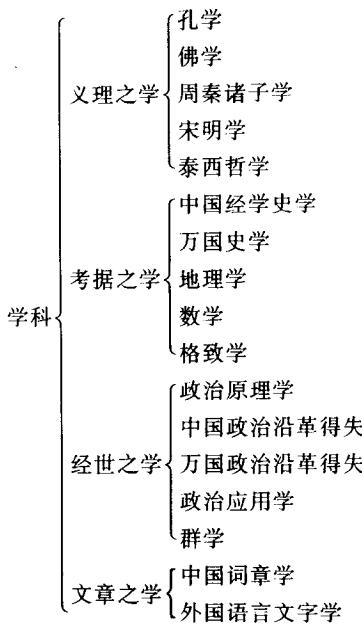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社会学

一、中国社会学的诞生

中国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上书变法未被采纳便回到他的家乡广州，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设长兴学舍，聚徒讲学。康有为自任总教官、总监督，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立教，以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要讲学内容。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①。在“为用”的西学之中，除了西方哲学、政治学和外国史学之外，社会学也被列入教学内容之中。不过在长兴学舍的学科科目中，当时把社会学（Sociology）称为“群学”，以下为长兴学舍教育大纲中学科科目^②：

① 梁启超：《康南海传》，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版。

② 同上书。



康有为所办长兴学舍学科之中的“群学”，系由谁人主讲及其具体内容，史载阙知，只能存而不论。但作为康氏之学生的梁启超于8年之后所撰《说群自序》中，曾有追述，可见此“群学”之一斑。“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颐，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梨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余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昧变法之言，颇有进也。叙曰，记曰，能群焉谓之君。乃古之君

民者，其自号于众也，曰孤，曰寡人，曰予一人，蒙窃惑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已群之败，他群之利也……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一人，因此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当行之事，使其群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①

对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的“群学”是否为西方引入的社会学，学术界曾有不同看法。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学产生的年代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探讨。韩明谟先生认为，“康有为 1891 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而陈树德先生认为，“当时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糅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②。

韩先生曾对“群学”作过解释，“所谓群学，是借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王制》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学，就是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③ 我认为，考之中国学术之渊源，历史上并无“群学”之说，应系康有为首创，其门徒如梁启超者则必为之鼓吹，犹如其之《大同书》。而后之严复亦承袭康有为之说，将斯宾塞之《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 译为《群学肄言》。当时的英语翻译，有依中国文化背景，亦有袭日人之译法。如格致、物理，亦如此。对于西方引入的一种新学问，当时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对于 Sociology，康有为、严复译为“群学”，谭嗣同、章太炎译为“社会学”，这就像当今学术界将 Games

① 梁启超：《说群自序》。

②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③ 韩明谟：《社会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Theory 译为“对策论”或“博弈论”是一个道理。康有为接触到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理论后，认为其与荀子之论有相似之处，而译为“群学”，在万木草堂讲授，是合乎历史情景的。但是，这里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康有为在 1891 年之前是从何处接触到西方社会学新知的。

与严复不同，康有为无留洋经历，英语亦不通晓。据我考证，康有为的西学思想和社会学知识主要来源于晚清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年十九从学于朱九江，以宋明理学为本，以经世致用为主，悉心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当康有为接触西学之后，即“谢绝科举之文”，且厌恶考据之学，“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①。

光绪三年（1879 年），他初读《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后游香港“览西人官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②。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对于康有为的西学知识颇具重大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 年），此年，康有为游京师，归时，“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此年他购“《万国公报》^③，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并有意欲纂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乐律、韵学、地图学。自感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12~115 页。

② 同上书，第 112~115 页。

③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 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1875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

“新识深思，妙语精理，仰读俯思，日新大进”^①。正如梁启超所云：“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② 在这种心态之中，康有为不大可能再有兴趣研究荀子的“群学”。故此群学应为西方之社会学。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判断中国社会学诞生于 1891 年，其诞生地点是康有为兴办于广州万木草堂的长兴学舍。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学的诞生应是一个过程。因为，一个新学科的产生，都有它的源与流，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源与流的交汇、融合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展开的。探讨中国社会学产生于某年某月，甚至某日，那是为了纪念的方便。而我们在进行学术的探讨中更倾向于把中国社会学看做是时代的产物。

二、中国社会学的源与流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社会学亦不例外。所以，它的产生必与当时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否则，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会枯萎，有时甚至产生都不可能。中国社会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叶的维新运动前后。所以 19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欧美腥风血雨所出现的种种变局，乃是中国社会学产生的本源。

19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清代中叶以后，度过了康乾盛世，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败的周期。面对 16 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企图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如果说乾隆帝尚可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114 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72 页。

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来拒绝英国马戈尔尼使团的企图^①，那么到了道光年间，清政府已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以《南京条约》为结局。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屈辱，而且也将中国纳入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范围之内。列强的冲击，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最早发出了回应，这就是以自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掀起。在与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最初交往上，洋务派总结历史的教训，认为中国败于器物层次，没有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引进西方的武器，进而自己生产武器，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

1894年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终结。堂堂大国，竟然败于小日本手下，对中国土人的刺激无疑是十分强烈的。日本之所以强，是因为经历了明治维新，从器物层次的改革，进入了制度层次的改革。这就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呼之欲出的原因。救亡与维新，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新学科的产生不仅有社会现实这个源，而且还有它的流。一门新学科的传入，尤其从域外传入，必与当时中国时代思潮碰撞融合而作出新的诠释。

乾嘉时期（1736—1820）统治中国学术界的无非是汉学与宋学。汉学即考据之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的士人“束发就学，皓首穷经”，不问世事，成年累月地从事古代典籍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之事。“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

^① 关于乾隆帝拒绝英国特使马戈尔尼的历史事实，请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

中天”^①，这就是当时学术界的写照。与此同时，宋代的程朱理学，经清政府的提倡推广，被置于学术界的正统地位。《朱子全书》广为流行，其《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窒塞空气，其嚣尘上。汉学如桎梏，宋学似牢笼，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正视与研究。

道光年间的社会危机和鸦片战争的现实，使社会思潮发生了转变，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受到了广大士人的响应。立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莫不在积极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

与此同时西方思想的传入，亦对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社会学正是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利马窦来中国传教，徐光启、李之藻等翻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开西学传入中国之先河。清康熙帝曾十分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李鸿章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以广方言馆，北京总理各国衙门亦设同文馆。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典籍二三十种。同时西方在华传教士亦颇有译书，并在《万国公报》辟专栏译介西学。由此可见，在光绪年间学术界欲求知识于域外，以炽然成一风气矣！“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诚如梁启超所说：“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可也。”^②

中国社会学即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通过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是一门体现时代脉搏的学科。

三、维新运动中的社会学

在中国社会学的诞生过程中，关注西学、研读社会学、讲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98页。